



## 全球经济：增长未见改善



作者：[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

2016年10月4日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9月份在杭州呼吁要让世界经济重返强劲、可持续、均衡和包容的增长，目前看来，此目标仍遥不可及。尽管最近这个季度没有出现进一步减速，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疲弱。根据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2016年，先进经济体的整体增速放慢，而作为抵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有所回升。整体而言，世界经济增长未见改善。如不采取坚决的政策举措为短期和长期经济活动提供支持，则近期这种低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这是由于低增长带来的诸多经济和政治负面影响。

我们预计2016年和2017年全球产出将分别增长3.1%和3.4%，与英国“脱欧”公投后不久的七月初的预测相同。然而，具体来说，我们小幅下调了先进经济体2016年的增长预测，同时对其他经济体的预计增速进行了上调。对这两个国家组2017年的增长前景的预测保持不变。中期内，我们预计先进经济体将继续保持一个令人失望的低增速；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则将有所加快，这是因为该国家组中大多数正在经历经济收缩的大型经济体将在中期内趋于稳定，并重返长期增长的路径。

然而，上述粗略的细分并没有体现出国家组别内部的重要差异。更具体而言，美国2016年的增长令人失望，但这部分地被欧洲和日本小幅的意外好转所抵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组别中，新兴亚洲的情况较好，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体表现受商品出口国经济下行的拖累（尽管一些小国受益于商品价格下跌）。

**为什么对最近的增长率不满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全球产出重心从成熟和增长相对缓慢的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趋势性转变理应逐步提高全球经济增速。但是，此情景尚未发生。

目前预计，所有地区的长期潜在增长都将低于1998 - 2007年的平均水平，而且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在一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其当期的增长速度仍然偏低。不可否认，有些国家的长期增长下降反映了人口发展趋势以及前一段时期出现的不可持续的发展因素，如：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带来的首轮生产率暴涨、中国经济增长的突然加速，以及最终以严重危机告终的全球金融上升周期。然而，负的产出缺口仍然普遍存在，危机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债务高企、银行不良贷款激增、通缩压力加剧、投资低迷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持续抑制潜在产出水平。由于担心收入增长会在较长时期内陷于停滞，投资者和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进而导致实际增长下滑。

如果全球需求提高，这些自我实现的机制则可以被扭转。但是，迄今采取的对应政策是不均衡的，过度依赖于央行。市场因之担心，在下一次大的负面经济冲击来临时，政策行动将没有转圜余地。

持续低增长还带来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后果。一些国家的收入分配持续严重偏向于最高收入群体，而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的空间非常有限，在这些国家，走出危机速度的缓慢和恢复的不完全所造成的伤害尤其巨大。在一些较富裕的国家，长期低增长导致了政治运动的兴起，人们将各种问题归罪于全球化，并设法把本国经济与全球大势隔离开来，逃避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脱欧”就是这类倾向一个例子。

简言之，增长过于低迷的情况持续太久，而且在许多国家，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只是极少数人，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又会进一步压低全球经济增长。

上述担忧也凸显了我们的预测情景所面临的风险，且这些风险仍偏于下行。我们虽然推定 2017 年及之后全球经济将会复苏，但以下因素以及它们的交互影响可能会导致这个推定的不成立，包括：中国的转型道路更为坎坷、商品价格进一步大幅度下跌、全球金融条件收紧，或贸易壁垒急剧增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再度出现剧烈变化，从而加剧中东和非洲的既有人道主义危机，导致决策环境进一步复杂化。

### 采取全面、一致和协调的政策

另一种较好的结果是，许多国家采取全面、一致和协调的政策，在政策工具、时机选择和国家之间实现协同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使其更具包容性。上周发布的[工作人员讨论说明](#)解释了此战略。所谓全面，其特点是“三管齐下”：用结构性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持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反过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结构性改革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扩张效应。一致和良好沟通的政策可以起到稳定预期的作用。各国间的协调——正如关于结构性措施的 2014 年布里斯班行动计划——可以产生有益的溢出效应，使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基金组织倡议的、基于“三管齐下”政策的上述一般性方法如果被广泛采用，将可以提高增长。如果能在大范围内实施，它还可以抵御负面全球冲击，限制其对财务状况造成的损害。

在结构性政策中，至关重要的是各国要重新承诺消除贸易壁垒，以扭转目前的逆流。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必须认识到，需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消除产品和服务市场准入壁垒，帮助那些最易受到科技、贸易和结构性改革造成的社会移位效应影响的群体作出调整。在此方面，政策制定者应发出清晰信息，并通过采取协调行动取得最大成效。

\*\*\*\*\*

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为此他暂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是伯克利分校“Class of 1958”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该校经济系主任（1998-2001 年）。在 1991 年前往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之前，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1979-1986 年）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86-1989 年）担任正式教员，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9-1990 年）。他就读于

宾夕法尼亚大学（1973年获学士学位）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75年获硕士学位），并于1979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4年7月到2015年8月，奥伯斯法尔德博士成为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此之前他曾担任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顾问（2002-2014年）。他还是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文理科学院研究员。奥伯斯法尔德博士获得的荣誉包括蒂尔堡大学特亚林·科普曼斯资产奖、Rajk Laszlo高等研究学院（布达佩斯）约翰·冯·诺伊曼奖和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他还发表了许多著名演说，包括美国经济协会的年度理查·伊利演讲、印度储备银行的L.K.Jha纪念演讲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格雷厄姆纪念演讲。他还曾担任美国经济协会执行委员、副主席。此外，他还在基金组织和全球多家中央银行从事咨询和教学工作。

奥伯斯法尔德博士是两本主要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联合作者——《国际经济学》（第10版，2014年与Paul Krugman和Marc Melitz合著）和《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1996年与Kenneth Rogoff合著）。他还著有100多篇关于汇率、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的研究文章。